


# 松毛岭战役：长征前在福建的最后血战

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，苍松掩映间，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。不远处的战斗旧址中，残存的战壕顺着山脊蜿蜒铺开，无声讲述着当年那场血战的壮烈。

时间拨回到1934年，横亘于长汀东南部的松毛岭，以其险要山势成为拱卫中央苏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天然屏障，为阻止敌人西进攻占瑞金、长汀，松毛岭战役就此打响。

在松毛岭上，驻守阵地的红九军团等部队的红军将士，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：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轮番猛攻阵地，红军将士依托山地工事浴血阻击，以数千人伤亡的代价，死死拖住敌军西进步伐。

1934年9月下旬，红九军团在离松毛岭不远的钟屋村（今中复村）观寿公祠前告别群众，自此踏上长征征途。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、党史专家王英表示，松毛岭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在东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战，为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、集结出发长征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
在如今的南山镇中复村，红军桥、观寿公祠、松毛岭战役战地医院旧址等红色遗存遍布街巷，往昔峥嵘岁月中的一个个故事，仍在人们口中流传。

红军烈士后代钟鸣，是村里的红色讲解员。他常年行走在红色遗迹之间，向游客介绍“家家无闲人、户户无门板”的场景，讲述乡亲们拆下门板赶制担架、修筑工事的故事，村中农历八月十四提前过中秋的习俗，以及当年军民共同备战迎敌的红色记忆。

“若要红旗飘万代，重在教育下一代。讲好长征故事，也是我这辈子的念想。”钟鸣说。

如今，红色资源正转化为中复村的发展动能。中复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椿源介绍，依托村中红色遗存，中复村探索出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。“我们联动周边村落，开发红色历史、客家非遗和农事体验相结合的研学课程，既带动村民增收，也吸引年轻人回乡扎根。”钟椿源说。

近年来，每年都有大批游客、学生来到中复村重走长征路、重温红色历史。村里开发的文创产品广受欢迎，全村40多家农家乐在节假日常常宾客满堂。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，经营起餐饮店、土特产商店等。2025年，中复村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，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。岭下的村庄，如今已成为产业兴旺、烟火升腾的幸福家园。

（据新华社）

# 渡口的追寻

“报告，集合完毕！”

“出发！”

号令声铿锵有力，红旗迎风飘扬，身着红军服的演员们整齐列队，目光坚定，凝视着前方。这里是江西于都东门渡口，沉浸式情景剧《告别》的演出现场。

于都河岸边一块刻着“长征渡口”的石碑，苔痕斑驳，字迹遒劲。不远处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，如同高扬的风帆正待启航。

1934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等8.6万余人集结江西于都，踏上英勇而悲壮的远征。

星夜渡河，告别无声，却震撼人心。

那是惺惺相惜的战友诀别。“红军抗日事长征，夜渡鄱都溅溅鸣。梁上伯坚来击筑，荆卿豪气渐离情。”渡口一别，留守苏区战斗的刘伯坚，次年在江西大余壮烈牺牲。

那是难舍难分的妻离子别。正如《长征组歌》所传唱：“紧紧握住红军的手，亲人何时返故乡？”于都河畔的大榕树下，怀有身孕的刘淑芬送别了丈夫，也等了他一辈子。

……

那一别，多少红军战士从此“北上无音讯”，将热血洒在漫漫征途。

2019年5月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于都考察调研，特别叮嘱大家：“现在国家发展了，人民生活好了，一定要饮水思源，不要忘了革命先烈，不要忘了中央苏区的老百姓们。”

两年后，一支由红军后代、志愿者组成的长征源演艺团在于都成立。他们用质朴的肢体语言，一次次将“妻送郎”“母送子”“托孤跪别”的历史画面拉回眼前。



这是于都东门渡口正在演出的长征主题情景剧《告别》。 新华社发

每一次“告别”，都是刻骨铭心的“铭记”。

双手捧上新纳的草鞋，仔细整理丈夫衣帽，紧紧相拥后决然转身……于都县文化馆职工卢毓芳在剧中饰演一名新婚妻子，她的高祖父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，时间和地点不详。

“新婚不久就把自己的爱人送走，这个角色是当年很多于都百姓的缩影。”卢毓芳说，每次参演，都会联想起高祖父出发的场景。

寒来暑往，支撑演艺团成员一次次站在渡口的，就是一个朴素而坚定的信念：只要有人记得，英雄就从未远去。

每一次“告别”，都是跨越时空的“追寻”。

今年70岁的王慧群是于都县自来水公司退休职工，在剧中饰演“表嫂”。她的父亲当年从这里出发，历经九死一生，最后回到于都。

“每次站在这里，仿佛都能看见父亲出发的背影。每演一场，就是对父亲那段历史的一次追寻。感觉离父亲更近了，对他的理解更深了。”王慧群说，父亲生前战斗无数，但从不说自己有多少战功。

尽管年事已高，每次有演出，王慧群总是积极报名。5年多时间，《告别》累计演出900多场，王慧群参演了其中800多场。

每一次“告别”，也是重整行装的“再出发”。

54岁的高金寿是于都一家美发店负责人，2021年6月偶然在渡口观看了一次演出，深受触动，当即报名。此后他演过号手、旗手、司令员。

然而，命运在2021年底给了他一张残酷考卷：鼻咽癌，放化疗后又发生骨转移。治疗期间，他一次次想起自己演过的那些角色。

今年，高金寿踏上了属于自己的“远征”。从江西出发，经湖南、广西、四川等地，一路西行。从泸定桥，到夹金山，每到一处，他都要去寻访沿途红军长征的旧址。

“这是我多年的梦想。”高金寿说。尽管现在有腿脚不便的后遗症，但正是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的精神鼓舞着他出发。

追寻你的足迹，“活”出你的样子——这是演艺团成员共同的心声，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回响。

宽阔的于都河静静流淌，几叶扁舟泊于岸边。

90多年前，于都百姓拆门板、架浮桥送别红军踏上长征路。如今，一座座“钢铁巨龙”横跨两岸，一个个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。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，早已换了人间。

今年暑假，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学子来到渡口重走长征路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大三学生李珊看完《告别》后，深受触动。

“观看演出过程中，很多观众都流泪了。人们没有忘记，支撑我们充满力量向前走的，正是这段历史。”李珊说。

（据新华社）

# 见证红军铁纪的『割麦证』

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里，珍藏着一块长约90厘米、宽约20厘米、厚约2厘米的木牌——这是当年红军筹粮时留给藏族同胞的“割麦证”。木牌纹理虽已斑驳，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，它虽没有经历战火硝烟，却以最朴素的文字，静静诉说着一段人民军队纪律如铁的往事。

1935年7月，红军从川西北高原黑水翻过打鼓山，抵达松潘以西的毛儿盖镇克藏村。此时正值青稞成熟的季节，可村庄里空无一人，田地里的庄稼也无人收割。原来，在红军到来之前，当地藏族同胞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蛊惑，误信红军“烧杀抢掠”的谣言，纷纷躲进深山。

当时，红军经过长途转战，粮草早已耗尽。战士们大多靠挖野菜、啃草根甚至煮皮带充饥，饥饿与疲惫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。眼前这片成熟待收的青稞地，是维系红军生存的唯一希望，却也成了考验红军军纪的一道严峻关口。

危急关头，前敌总政治部迅速颁布筹粮纪律：非必要不收割群众粮食、优先征用土司头人粮食、收割群众粮食必须留下凭证、严禁损害未成熟作物。这一筹粮纪律，将“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”“买卖公平”“损坏东西要赔”的铁律，转化为可执行、可追溯、可兑现的刚性准则，是人民军队一系列纪律要求在绝境中的坚决践行。

军令既出，全军一体遵循。红军以班排为单位统一收割青稞，每块田的收成都经过精细计量、逐田登记。每收割完一块田，战士们就会将前敌总政治部统一制作的木牌“割麦证”竖在田头，盼着群众归来后，能凭此兑换所需物资。

木牌上的字迹质朴庄重，承诺掷地有声：“我们在这丘田内割了青稞×××斤，我们自己吃了，这块木牌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凭证。请你们归来以后，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，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、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，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前需要好好保存这块木牌子。前敌总政治部，麦田第×××号”。珍藏在红军长征纪念馆中的这块木牌上，“二百斤”3个字颜色比其他字迹更深——由于当时红军缺乏精准计量工具，便特意留下空白，待当地群众归来后，可根据往年收成估算粮食数量自行填写。

整个过程中，没有少计漏登，更没有强取豪夺。各级纪律检查队巡回督查，逐田核对收割数量与牌文内容，确保每一笔都分毫不错，用行动守住了秋毫无犯的军纪底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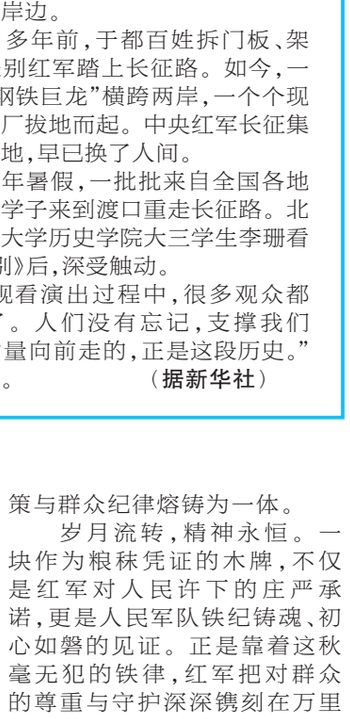
数日后，当地群众返回家园，只见村寨安然无恙，田亩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每块麦田旁都立着木牌。红军依旧风餐露宿，不敢惊扰百姓生活。眼前的一切让群众深受触动，他们终于意识到，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截然不同，心中的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由于当地群众多为少数民族，大多不识汉字，红军留下的很多“割麦证”没能发挥兑换作用——有的被当作柴火烧掉，有的被用来修补房屋、充当粮仓盖板，如今纪念馆珍藏的这块木牌，正是因被用作粮仓盖才留存下来。

从一块块“割麦证”开始，在川西北高原辗转战斗的一年多时间里，红军各部队在藏、羌群众的支持下，共筹集粮食2000余万斤、牲畜20余万头，为顺利穿越草地、北上抗日奠定了物质基础，书写下“牦牛革命”的壮丽篇章。

彼时长征路上，类似的纪律坚守并非孤例。1934年长征出发之初，红军总政治部便在《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》中明确要求：“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……坚决与脱离群众、破坏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”。1935年1月，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告知群众，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，是有严格群众纪律的军队，不拿群众的一点东西，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，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，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。1935年5月，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，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，以六言韵文明示全军：“红军万里长征，所向势如破竹；今已来到川西，尊重彝人风俗。军纪十分严明，不动一丝一粟；粮食公平购买，价钱交付十足”。部队严格遵守命令，遇袭不开枪、受扰不反击，以绝对克制赢得彝族同胞信任，终成“彝海结盟”的历史佳话。途经苗族、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时，红军露宿村外、不入民宅，买卖公平、损物必赔，将民族政策与群众纪律熔铸为一体。

岁月流转，精神永恒。一块作为粮秣凭证的木牌，不仅是红军对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，更是人民军队铁纪铸魂、初心如磐的见证。正是靠着这秋毫无犯的铁律，红军把对群众的尊重与守护深深镌刻在万里长征的漫漫征途上，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下，以纪律立信、以初心聚力，凝聚起跨越万水千山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伟力。



红军“割麦证”。（资料图片）

（据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# 古人看天“硬”科技

我国最早的天象观察，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。《尚书》已记载公元前2137年掌管天文的羲和其人其事。从汉初到1785年，我国共记录有日食925次，月食574次，堪称世界之最。古人看天，有着实打实的科技支撑。

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作为动力的浑象（一种表现天体运动的演示仪器，类似现代的天球仪）。这架仪器的主体是一个直径四尺六寸的大圆球，球上画有二十八宿、中外星官、赤道、黄道、北极常显圈、南极常隐圈、二十四节气点，整个球安装在南北极轴上，可以绕轴旋转。

张衡还在浑象上装了一套齿轮机械传动装置，利用漏壶中流出的水，推动整个浑象均匀地与天球做同步运转。这样一来，昼夜交替，星辰出没就和实际天象相一致了。

除此之外，张衡还给它配了个“自动日历”，叫瑞轮蓂荚。传说尧帝阶前有种神草“蓂荚”，每月初一长一片叶子，十五后每天落一片。张衡就用齿轮凸轮（关戾）做了个机械板，把它接在浑天仪底下，随着月亮盈亏，叶子每天自动开落一片——这才是真正的“看叶子就知道几号”，比翻日历浪漫多了。

汉代以后，中国测量天体的仪器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。

北宋元祐七年，62岁的苏颂和53岁的韩公廉，在汴京的文明殿东鼓楼下立起了一座12米高的木楼。它是一座水运仪象台，集观测、演示、报时于一体。仪象台靠水力驱动，楼顶的板子可以开合——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有活动屋顶的天文台，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。

整个水运仪象台以漏壶中的水为驱动力，通过一套传动装置和一个机轮联结在一起，与天球同步运转，逼真生动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。最神奇的是楼里藏着一套“天衡擒纵器”，就像钟表的心脏，每隔一阵“咯噔”一跳，控制着整个系统的节奏。

英国人李约瑟后来研究天衡擒纵器的秘密，说这比欧洲同类技术早600年。此时，西方人才知道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有了一座天文钟。

当然，苏颂并不是凭空起高楼。在他之前，有个叫张思训的四川人，已经造过一座太平浑仪。它高4米多，“规天矩地”，内部齿轮咬合精密，机械人按时辰轮流出来报时，左手摇铃，右手扣钟，中间击鼓，一套自动化流程下来，满朝文武都看傻了眼。

但张思训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麻烦——水力驱动的仪器一结冰就罢工，在冬天无法使用。

张思训琢磨来琢磨去，最终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法子：用水银。《宋史·天文志》记载：“今以水银代之，则无差失。”简单的13个字，背后却是一个工匠对物理性质的精准拿捏。

苏颂的水运仪象台在张思训的基础上，又进了一步。水运仪象台有三层：顶层放浑仪，专门看星星，屋顶能开合；中层放浑象，是个大圆球，人可以钻进去，能看见满天星斗；底层是动力间，五层木阁里藏着160多个小木人，到点就敲锣打鼓报时。

整个装置高12米，宽7米，像个木头搭的巨人，站在汴京城的晨光里，咯吱咯吱地转着，把日月星辰的运行一五一十地展现出来。

元朝时，有个叫郭守敬的邢台人，从小就爱鼓捣天文仪器。他检视了司天台里那台北宋留下的浑仪，发现南北极的度数差了将近4度，石圭也歪了。于是他干脆推倒重来，一口气造了20多种新仪器，其中最硬核的，叫简仪（一种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）。

郭守敬把传统浑仪里那些互相嵌套的环拆开，分成赤道和地平两套独立的系统，视野一下子开阔了。他还给简仪装了个滚柱轴承。

简仪的创制，是中国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一大飞跃，是当时世界上的一项先进技术。欧洲直到300多年后的1598年才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与之类似的装置。

另一个叫仰仪（大型铜质天文观测仪器），是一个半圆形的铜球，直径3米，内壁刻着经纬网。太阳光从小孔射进去，在球内壁投下一个倒影——观测者背对着太阳看，眼睛不晃，日食的时刻、方位、食分，一清二楚。这架仪器还能观测月球的位置和月食情况，被称为“日食观测工具的鼻祖”。

还有一个最绝的，叫景符（高表辅助仪器），一块小小的铜片，中间开个小孔，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，把四丈高表投下的日影精确到两毫米以内。2021年，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建成100米圭表塔，就是沿用郭守敬的高表设计原理，并配备景符仪器。

有了这些硬家伙，郭守敬奏请忽必烈，在全国设27个观测站，东到高丽，西到滇池，南到海南岛，北到贝加尔湖，同一时间测日影、测北极星高度。数据汇到大都，郭守敬带着王恂等人算了一年又一年，最后拿出一部《授时历》。

（据《海南日报》）

# “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”

“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”，现指用自己狭隘、卑劣的私心杂念，去揣测、揣度品行高尚之人的胸襟与想法。

该成语原始语句为“以小人之腹，为君子之心”，最早出自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。春秋时期，魏舒（魏献子）执掌晋国国政。当时晋国梗阳（今山西清徐一带）发生一起诉讼大案，败诉一方为逃避惩处，打算进献女乐、歌姬乐队贿赂魏舒，试图徇私枉法。魏舒的下属阎没、女宽二人，知晓此事后，想要委婉劝谏魏舒坚守公正、拒收贿赂。二人受邀陪同魏舒进餐时，全程三次叹息。魏舒心生疑惑，主动询问二人频频叹息的缘由。

二人从容解释：“饭菜刚上桌时，我们担心食物不足，故而第一次叹息；用餐过半时，我们自觉多虑，心中自省：将军待客向来宽厚，怎会让宾客食不饱腹？于是第二次叹息；待到用餐结束，我们心生感悟：普通人的肚腹，饱足便会知足、不再贪求，但愿身居高位、心怀大局的君子，心境也如同常人饱腹一般，懂得知足、知止有度，因此第三次叹息。”

二人借吃饭知饱足的浅显道理，含蓄劝谏魏舒：身居执政高位，手握司法大权，应当克制贪欲、秉公断案，切勿收受私利、违背公正。此处的“小人”，是二人对自己的谦称，并非指品行卑劣之人，整句话原本是善意劝谏、劝人知足守正的褒义、自谦表述。

历经后世长期流传与语言演变，原句“以小人之腹，为君子之心”逐渐讹变、定型为如今的“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”。语句语序、用字发生改变，语义也彻底反转，从原本劝人清廉知止的正面劝谏，变成了批评人心胸狭隘、以私揣公、妄度他人善意的贬义成语。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